

# 艾芜文集

---

南 行 记

南 行 记 续 篇

---

1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217/73

# 艾芜文集

第一卷  
南行记  
南行记续篇

四川人民出版社  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56468



850408

责任编辑：李定周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艾 芜 文 集 (第一卷)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21 插页 7 字数448千

1981年11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900册

---

书号：10118·457 (精装)定价：2.80 元



一九三一年作者在上海



## 出版说明

艾芜同志，四川新繁县人，是我国文坛著名的老一辈作家，现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。他的创作，生活厚实，风格别致，充满诗情画意，而又包含深刻的社会意义，在国内外读者中享有盛誉。为纪念作家创作五十周年，我社从今年起陆续编辑《艾芜文集》出版。

《艾芜文集》第一卷，收入小说四十三篇，包括《南行记》、《南行记续篇》。其中《左手行礼的兵士》、《七指人》、《红艳艳的罌粟花》、《老段》、《印度洋风土画》、《玛露》六篇是新收入的。在编选中，作者对所收作品，以南行历程为序，重新作了编排。

# 序 言

艾 芜

四川人民出版社打算今年出版我的文集，说要作为我从事写作五十年的纪念，这是不敢当的。但我同意出几本书。于是文集前面得有一篇序言，我便放开别的写作，坐下来写。提着笔的时候，一个问题忽然来在我的头脑里：五十年前的今天，即一九三一年的时候，我在哪里？我正在缅甸的仰光，而且是在仰光的 Lock-up（华侨称为落鸭铺，即所谓拘留所）内，待到这一年一月末尾，便被驱逐回祖国的厦门。被捕的那个时候，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，我正在《新芽日报》的编辑室（附属于《仰光日报》里）作编辑附刊兼校对的工作。同时被捕的有《新芽日报》的总编辑林环岛（实际就是我们两人编这份报纸），还有在《仰光日报》作翻译的王思科。后来又从缅甸小城镇抓来教书的郭荫棠，同我们关在一道，又一齐驱逐离缅。仰光的英文报纸、缅文报纸、以及国民党办的华文报纸《觉民日报》，都登载了此事，渲染为驱逐了四个赤色分子，为该地除了祸患。我们都觉得只不过在报纸上写些文章和文

艺作品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值不得大惊小怪。但是，由于这一年，缅甸达拉瓦底县农民暴动，尽管采取成立新缅王的老办法，可就震动了英帝国主义的统治，因而便加重了对我们的疑惧，用杀鸡吓猴子的办法，威吓其他的人。解放后，参加回国观光团的陈兰星（《仰光日报》的总编辑）告诉我：那次我们四个人被驱逐之后，缅甸英国当局曾派人给仰光华侨人士看一张照片，有我和新加坡共产党人开会时照的像，证明确实确实这次被驱逐的人中，有共党分子。陈兰星亲眼看见，并和其他人一样，信以为真。我大为惊异，我到过新加坡，但并没有照过像，更没有和别的开会的人共同摄过影。我当时确实去开会，但是到了马来亚的槟榔屿，便和全部三等舱搭客，被押到一个小岛上，消毒和防疫一星期，始准登岸自由活动。这由于我搭乘的船，是从印度曼德拉斯经过仰光来马来亚的，而这两个港已被宣布为疫港，三等舱搭客不经检疫一番，不能登岸。我在小岛上住了一星期才到新加坡，会期已过了，当然什么开会的人，都没有见着，哪还能会后共同摄影呢？再则，地下活动从来不会相聚留影的，岂不是有意授人以柄吗？这可以证明英帝国当局的警探，有狡猾的一面，会制造假的证据。另一面，又显得很愚蠢，缺乏地下活动的常识。而且小题大做，茶杯里也要掀起风浪。今年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黄重远（缅甸华侨，在仰光时的朋友）来信，说有归国的缅甸华侨，在编写缅甸华侨历史，参考了苏联新编的缅甸历史，谈到一九三一年驱逐华侨政治犯的记载，说是驱逐了十一人，问我是否属实。我回信说，就只有四人。这就是英帝国主义，为了吓唬人，小题大做，尽力渲染的结果。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也为此一历史小



事，吃了苦头。在成都郊区昭觉寺，当时改为临时监狱，把我押了进去，要查我两次被捕的案情。其中一件，便是在仰光被捕，是否叛变过。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，放我出来那一天，成都警备区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，找我谈话，说是为什么押了这么久（从一九六八年的四月，押进学习班，八月十七日再转押进监狱起，到一九七二年三月止，共四年），是因为调查手续太麻烦，一要查在上海被捕，二要查在仰光被捕。关于仰光的被捕，还请我国驻缅甸大使馆查过一九三一年缅甸的各种报纸，费力不少，由此关押时间，也拖久了（实际上两次被捕，早已向组织交代清楚了）。

其实五十多年前，我主要是搞文学工作，并不能算是一个搞政治的人，只不过是写的文学作品，容易招祸而已。以后，为生活所逼，没有法子，只好走上文学写作这条道路。

## 二

我回头看一看，我从缅甸仰光的华侨报纸写起，已有五十多年了。我是不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就下定决心，要用一生的光阴，拿着笔杆活动呢？没有。我在四川成都盐道街进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对所学的功课，最喜欢数学（代数、几何）和植物，而且想有机会读大学，就要进数理系或生物学系。对于小说、戏剧、诗歌也爱好，但都用课余时间阅读，没有使用主要的学习时间，甚至也没有想过，到大学去学文学。

我在读小学的时候，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好在课外读别的书，尤其高兴读小说书。我的一个远房叔父，家藏许多小说

书，侠义小说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七剑十三侠》等，公案小说如《包公案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等，演义小说，如《西汉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说唐演义》等，我都全部借来看过，引起极大的爱好。这是在乡村初级小学读书的情形。到了高级小学（全县只有一所，算是一县的最高学府）已经没有什么旧小说可看了（事实上，有些小说已借不到了，或者连书名也不知道），但课余要看书的习惯，改不掉，就从图书馆借读到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、《少年中国》这类的杂志，首先要看的，便是其中的新小说、新诗歌、新话剧。胡适的《尝试集》，康白情的《草儿》，沈尹默的《三弦》以及黄仲苏描写自然风景的诗篇，都是再三再四地读。法国作家法郎士写的话剧《哑妻》（登在《新潮》上），也尽力钻研。进了省城的师范学校，即使引起兴趣的功课多了，需要不少的复习时间，但追求课外的读物，也还是热烈的。除了读创造社的《创造季刊》、《创造周报》，语丝社的《语丝》，文学研究会的《小说月报》而外，还从图书馆借阅林琴南用古文译的欧美小说。

尽管在课外爱读书，但对学校的课业，从没有疏忽过，也没有在教室里，一面听课，一面偷看小说。由于认真学习老师教的功课，我在乡村初级小学，就把文言作文这一重要关口过了，即是用文言文能写通通顺顺的文章。一九一八年，四川省教育厅的省视学万克明到新繁县，举行观摩会，集中全县的小学生，进行考试。我那时是初小三年级学生，国文考试题目《观摩会记》，我用文言文应考，得到全县三年级学生的第一名。这在我生活中，是一件大事情。我家里已认为我读过初小，不是文盲就可以了，没有要我再进学校，事实上也没有充

裕的钱，来供给膳学费。因为考到第一名，又得了奖品，我再加以要求，主动考上城里的高等小学，父亲便答应一个月送学校一斗米（三十六斤）一元钱，让我进城读书，总之，观摩会的会考，是我生活中一大转机。这就是幸好我没有因读课外书，就耽误了正常学习的功课。

省立师范学校五年毕业（一年预科，四年正科），我读了四年，就朝外省外国去漂泊，一则由于要废除婚约（家里要我毕业后结婚）远走他乡，一则由于习惯爱好读书，想找半工半读的机会。当时不知道留法勤工俭学，错过了机会。上海办的工读互助团又失败了。只有自己出外去寻找。在旅途上，我带的是胡适的《哲学史大纲》，梁漱溟的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马寅初的《经济学演讲集》，吴稚晖的《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及宇宙观》，以及熊得山的《社会学》。我那时还是以学习哲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，作为主要的功课，而对文学的阅读，还是放在次要的地位。这还是近于在学校读书的情形。

可是旧社会不容许你半工半读，有时工作找不到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还有什么机会学习嘛。哲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都需要大量学习前人研究的成果，哪有机会找到他们的文集呢？我一路走的荒山穷谷，就连任何书都见不到。只是接触到的人和事，引起新奇的感觉，容易激起情绪的波动。要想表示自己的看法，发抒自己的情绪，倒是写诗写散文，比较适合，更能满足精神的需要，使孤寂的生活，得到安慰。

到了缅甸的仰光，求到职业的机会很少。恰好通过万慧法师（一个很有学问的僧人，懂十几种文字，尤精通梵文）的关系，和华侨文化界有了接触，三家华侨报纸的副刊，每天都有

一大版的版面，需要各种各样的文章。《仰光日报》（以前属于北洋军阀那个系统，同国民的报纸一直抱着对立的态度）的总编辑陈兰星和编副刊《波光》的云半楼，都首先欢迎登载初学作者的稿子，几乎是一投去，就得到登载，而且还有稿费，这对于我这个不容易找到工作的人，便有很大的帮助。可以说逼我走上文学之路，乃是生活处境使然。而且我也乐于走这条道路，因为一向养成了爱写作的嗜好。

一九三一年春天，统治缅甸的英帝国政府，驱逐了我和三位友人，并押送到香港。在香港的拘留所关了一夜，放逐到厦门，后来又转到上海。寻找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严重问题，又提到我的面前。没有事做，手又痒了起来：又写诗和小说，以及散文，向上海的报纸杂志投去，用作品去敲敲门。有的遭到退稿，有的登了，不给稿费，或者给予最少的稿费。没有灰心，还是写。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同时，也没有别的事。

后来遇见了沙汀，他有志于文学事业，那种认真的精神鼓舞了我。再加鲁迅先生的指引，对于题材的选择，有了新的看法。还有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科学论断，认为中国的革命，主要是反帝反封建，使我感到文学工作的天地广阔了，文学工作的方向明朗了，可以走了下去。在仰光的时候，尽管什么作品都写，但没有在上海期间这么有信心，对未来要做什么，并不茫然。在仰光我还想去海上作海员，那时认识一些海员，大都是海南岛人，他们走的港口多，熟识各个国家的情形，眼光看的远，接收进步思想快。我羡慕过他们海上的生活。因为我心里从不把文学工作当成一生的职业。然而，在上海要靠写作为生，还是十分艰苦的。起初左翼作家联盟在小

书店出的一些文学刊物，带突击性质往往不给稿费。在这段期间，生活极其困难，在缅甸的友人黄绰卿（一个排字工，自学成功，精通中文和缅文，成为诗人和翻译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缅甸政府把他当成共产党，加以驱逐，回到国内，则被红卫兵造反派当成缅甸政府派来的特务，斗争折磨致死）向华侨募捐来救济。有时钱没汇到，便向沙汀借钱生活。待到生活书店出《文学》、《太白》、《光明》，读书出版社出《读书生活》，申报革新《自由谈》，中华书局出《新中华》，北新书局出《青年界》，上海杂志公司出《现代》，这才有稿费，可以维持生活。但收入是不稳定的。在云南就认识的黄洛峰，当时任读书出版社的负责人，曾劝我同他一道搞出版工作，我觉得做一件事情，就该全力以赴，不会找出多少时间继续写作，我便谢辞了。我觉得既然要朝文学道路走下去，就应该不怕道路坎坷，和沿途丛生的荆棘。

在桂林，曾经短时间有过这样的事情，爱人生病，又没请人帮忙，便左手抱着小孩，右手执笔写文章。有好些作品写了，就发表，没有好好加以修改。有的长篇，一面写，就一面发表。这都是不好的。但那生活的压力，确是叫人难以忍受。

在重庆南温泉乡下住的时候，没有米下锅了，就赶快到重庆去找叶以群。他那时和盛舜，在办文联社，作家交给他们文章，由他们发到各报副刊和刊物去。他们可以预支稿费，即使没有文章也可以先借一笔。这对我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。后来搬进重庆市里，在中华文艺协会重庆分会的会所（张家花园八十五号，原是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的会所）居住，有一次，大风吹去房顶的瓦，一下雨，几层楼的住户，都会受灾。房东巴蜀

中学不肯出钱修理，要各户逗钱培修。楼下一层，全是会所，谁能出得起这笔钱呢？我只有找叶以群，那时他已去香港了，但得到我的信后，他也设法寄一笔钱来，修好房顶使会所可以继续租下去，我也能有个可以写作的安静地方。

只有在全国解放以后，才没有生活的忧虑了，不仅稿费有保证，而且国家把作家安排在文艺单位，付以工资。这是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幸福。一九五二年我到鞍山的工厂，和工人生活一年半，没有写什么作品，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费用，全由国家负担，使我能够专心一意地体验工人的各种生活。搜集写作需要的题材。在解放以前，文学工作者能有这样写作的好条件吗？也可以说，从来没有起过这般的梦想！不幸好景不常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，三十年中，却有十年不准写作，还用莫须有的罪名，押进监狱，每个月给生活费十五元，这种飞灾横祸，也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。但愿这样的事情，再也不要发生了。

1981年1月2日于成都

# 目次

## 南 行 记

原《南行记》序.....	3
《南行记》重印题记 .....	8
人生哲学的一课.....	11
左手行礼的兵士.....	31
快活的人.....	38
七指人.....	47
流浪人.....	53
荒山上.....	77
乌鸦之歌.....	87
松岭上.....	96
月 夜 .....	110
森林中 .....	128
山峡中 .....	152
瞎子客店 .....	170

红艳艳的罌粟花 .....	183
我的旅伴 .....	200
在茅草地 .....	255
山 官 .....	265
羊官与鸡 .....	276
我诅咒你那么一笑 .....	285
山中送客记 .....	302
偷马贼 .....	314
私烟贩子 .....	320
寸大哥 .....	331
玛 米 .....	340
卡拉巴士第 .....	348
我们的友人 .....	356
老 段 .....	366
安全师 .....	370



我的爱人 .....	382
印度洋风土画 .....	387
海岛上 .....	408
海 .....	423
《南行记》后记 .....	431

## 南 行 记 续 篇

《南行记续篇》序言 .....	435
野牛寨 .....	440
芒景寨 .....	464
姐哈寨 .....	491
边寨人家的历史 .....	503